

## 目 錄 Contents

---

### ❖ 人物研究 ❖

- 陳獨秀與瞿秋白及其晚年的反思 ..... 沈寂 武菁 1  
從上海到香港——張愛玲的雙城故事（1941–1955 年） ..... 黃耀忠 8

### ❖ 書 評 ❖

- 李炳坤著《陶行知與專題研習——  
兼論其對香港 21 世紀專題研習的啓示》 ..... 文兆堅 15

### ❖ 書 介 ❖

- 明史研究書籍提要補編（一） ..... 周佳榮 18  
中國連環畫史新書兩種介紹 ..... 丁 潔 30

### ❖ 學界動態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2008 年下半年） ..... 資料室 31  
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紀要 ..... 資料室 35

---

\* 本期封面及封底：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照片由周佳榮教授提供，謹此致謝。

❖ 人物研究 ❖

## 陳獨秀與瞿秋白及其晚年的反思\*

沈寂 武菁

在中共黨史中，長期以來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源泉，瞿秋白則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兩人在臨終前均留有「反思」：陳獨秀有《我的根本意見》，瞿秋白有《多餘的話》。自本世紀始，陳獨秀的形象有所改善，瞿秋白似乎依然如故。今天試將二人放在同一鏡框中考察，作一種嘗試。能否知新！

### 一

陳獨秀生於 1879 年，正是清廷自強新政時期，受「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方略所啓蒙。1897 年陳獨秀 19 歲，赴南京鄉試，在考場中目睹當時的「掄才大典」，竟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展覽會，因此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sup>1</sup> 就此由「選學妖孽」轉為康梁派，關心國家命運。「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今是而昨非」。<sup>2</sup>

陳獨秀 1901 年自費留學日本，1903 年在拒俄運動中組織愛國會，竟被說成「革命」而遭通緝，則成立岳王會，使蕪湖成為中江革命策源地。武昌起義後，1914 年在《甲寅》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被稱為「汝南晨雞」。翌年創辦《青年雜誌》，「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掀起空前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後，陳獨秀把「專在知識分子方面」的注意力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把目光從西歐資本主義世界轉向東方無產階級蘇維埃。1920 年創建中國共產黨。

瞿秋白出生於 1899 年，晚陳獨秀整整 20 年。時值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組保皇會。嗣後清廷實行新政，廢科舉而至遜位。1917 年瞿 18 歲，想從武昌赴北京拜晤陳獨秀，臨行時對羊牧之說：「《新青年》給人耳目一新，陳獨秀的文章更能鼓舞人，我一定要去拜會這位尊師。」到北京後，進入外交部的俄文專修館。「五四」運動中，瞿為俄專代表上街演說。同年與鄭振鐸等創辦《新社會》旬刊，其發刊詞就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由瞿執筆的。1921 年作為北京《晨報》記者前往蘇俄，翌年 5 月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1922 年轉為中共黨員。

---

\* 2008 年 8 月 24 日於安徽大學。

1 〈實庵自傳〉，《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426。

2 〈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 2 卷第 1 號。

陳獨秀的世界觀形成在西學東漸之時，瞿秋白的世界觀則形成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傳入中國之時。隨著共產黨在中國成立，陳瞿二人開始了新的一頁。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促成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陳在廣東未出席，仍被選為書記。1922年7月，陳獨秀親自召開中共「二大」，制定中國革命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並通過《中共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馬林提出國共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建立聯合戰線，陳表示反對。9月，偕劉仁靜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贊成一切工作歸國民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大會提出無產階級是民族革命的領導者，但他只說是督導者，被選為中央總書記。1927年4至5月中共「五大」，陳獨秀雖仍被選為中央總書記，已被批評為右傾投降主義。7月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陳停止領導職務。「八七」緊急會議，陳獨秀未被通知參加。1928年6月，陳獨秀拒絕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29年被共產國際開除黨籍。

瞿秋白在1922年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由蘇俄被攜回國。任《嚮導》、《新青年》和《前鋒》編輯和主編，為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馬林所賞識。在中共「三大」會上，按共產國際指令，全力支持加入國民黨，並起草修改黨章，被稱為「唯一能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實際情況的同志」。<sup>3</sup>

鮑羅廷來中國，亦依重瞿，參加國民黨改組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執行共產國際統一戰線，在國民黨右派提出彈劾共黨案時，提議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中共中央不准瞿「擅稱代表」。1925年中共「四大」，瞿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由共產國際所支持。1926年6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在上海成立，陳獨秀與瞿秋白為該局常任正副代表。瞿由此得以參與對中國革命的指導。1927年因瞿秋白完全擁護共產國際1926年底「七大」決議，被視為值得信賴的中國人。授意撰《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並在武漢迅速刊印，在中共「五大」上散發。「八七」會議，瞿秋白被扶上台，替代了陳獨秀。瞿則推行羅明那茲的冒險盲動「紅色恐怖」。共產國際「九大」決議，下令制止左傾盲動，則轉為主張以農村為根據地的農民革命。1928年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後，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1930年回國糾正「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瞿秋白離開中央領導崗位，與米夫、王明等宗派矛盾有關。1934年奉命赴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擔任教育人民委員。

在1921至1927年間，陳獨秀與瞿秋白在黨內位置的更迭，固然是共產國際的作用，但與瞿秋白有關。關鍵是他在1927年2月撰〈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sup>4</sup>其副題是「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其氣勢凌厲，無異是說，中國革命中存在著孟什維克主義，還能算是第三國際成員嗎？是對陳獨秀任職期間的政治路線作了總清算。瞿秋白在文中提出五個方面的問題：（1）中國革命嗎？（2）誰革誰的命？（3）誰能領導革命？（4）如何去爭領導？（5）領導的人怎樣？文章論證中國共產黨在1、2、3、4四個方面都犯了孟什維克的錯誤，因此最後（第5）歸結為中共領導人有病，「老實不客氣說，他

---

3 1923年6月20日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頁477。

4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引自此文者不一一加注。

有一點兒病，亦許不止一點兒罷！」言外之意是，應該下台了。其結果應驗了瞿秋白的預期。其因果關係值得研究。其中第 1 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茲姑不論。今將其中 2、3、4 三個爭論問題的雙方論點分析如下：

（一）誰革誰的命？這應以中國革命的性質來定。把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分兩步走，與社會主義一次革命，兩者的革命對象是不同的。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它的來歷。

翻開中國的近代史，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自辛亥之後，仍是資產階級革命。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黨成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列寧在 1919 年成立共產國際後所推行的。旨在消滅世界資本主義，並把重心放在東方的中國。這種矛盾的歷史現象，就出現了畸型的歷史觀。先讓我摘引一段列寧 1920 年在共產國際「二大」上一段有關中國的講話：

共產國際只是在一切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集合起來，並通過教育認識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這些特別任務的條件下，才應當援助殖民地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sup>5</sup>

意圖使落後國家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為其所用。中國共產黨就是「落後國家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所以馬林說它「是個早產兒（1920 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創造出來的）」。<sup>6</sup> 它確實接受了「特別任務」的教育。但陳獨秀雖然接受了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也同意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仍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所以「二大」提出兩步走。這方針與列寧主義是抵觸的。瞿秋白列為爭論問題之一。他說：

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的勝利終究是社會主義的……設想國民革命的民權主義勝利之後，將要很快的實現無產階級的第二次革命……這種學說，的確是中國式的杜洛茨基主義，是非常之錯誤的。

中共「一大」所制定的綱領，是共產國際的方針，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直接目標。陳在「二大」提出分兩步走後，五名中央委員，達林說，「分裂了兩派」，馬林說有四個成為「小團體」。1922 年 8 月，陳獨秀遞交馬林一封信，說「他不想再擔任中央委員會的職務」。馬林認為「他（陳獨秀）是唯一有領導能力的同志」，所以在西湖會上，「使陳獨秀恢復任職」。<sup>7</sup> 兩步走還是一步走，中共中央對此始終未得統一認識。蔡和森在 1928 年 11 月說：「總括一句，這是『二次革命論』，中國原始的孟什維克傾向。」<sup>8</sup> 「二次革命論」就此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

（二）誰能領導革命？——中國革命之戰術問題。

列寧當年設計的中國革命，依靠的是資產階級國民黨，不成氣候的中共僅充配角。1926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6 日共產國際「七大」，確立了斯大林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地位。共產國

---

5 《列寧選集》（4），人民出版社，1960 年，頁 275。

6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

7 同上。

8 蔡和森〈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790-791。

際「七大」決議，宣佈中國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通向這道路的保證，是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瞿在文中貫徹了此路線：

中國革命即使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也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不能勝利、因為他根本是農地革命，何況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

陳獨秀的意見正相反：

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者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sup>9</sup>

因為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點。<sup>10</sup>

那麼，瞿秋白說中國革命「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導」的實力從何而來？他說：

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並非「友軍」，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擴大。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正在於這一點；如今中國無產階級要領導最多數的農民起來革世界資產階級的命，而且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得勝利於鄰近的俄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那末：中國國民革命不僅得著世界社會革命的「輔助」，並且自己也帶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了。

原來「力量」與模式，均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其真實之意是：「非由共產國際取得領導權不能勝利」。

（三）如何去爭領導？——中國革命中之策略問題。

瞿秋白說：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完成革命戰爭（和民眾暴動相結合）及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各地民眾直接選舉民權的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純粹左派政策的國民政府，進行革命戰爭到底。……總之，我們應當認定：要用「勞工階級的方法實行國民革命」。

以小制大，必須以「術」。莫斯科援助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與之結成臨時同盟，以期衝破世界帝國主義在東方的一角。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三派。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要保持「獨立性」，是全面監控國民黨。把思想的差別劃為政治的敵我，你死我活無辜的流血互鬥。1924年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內設「國際聯絡委員會」，以「哄騙」國民黨及其右派，<sup>11</sup> 殊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是莫斯科的「統一戰線」，是手槍之外的武器——製造與敵人擁抱的機會，把敵人在擁抱中扼殺。<sup>12</sup> 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是對莫斯科統一戰線的反彈嘗試，1927年四·一二「政變」，是統一戰線在這一時期的結束。

陳獨秀視國民革命中的國共關係為「聯合戰線」，彼此是獨立的、平等的。他反對共產黨人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的合作方式。後來遵循共產國際之命，同意「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9 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10 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號（1923年12月1日）。

11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532。

12 郭恆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代序，東方圖書公司，1991年，頁5。

是為推進國民革命。他在回答馬林提問時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不是聯合戰線問題，而是在國民黨內工作。我們應該在國民黨內工作，因為國民黨軟弱渙散，而不是如蔡（和森）所說等國民黨情況好轉時我們再加入。」<sup>13</sup> 陳獨秀不理解莫斯科的統一戰線，更不會運用這統一戰線，所以遇到難以解決的關鍵問題時，總是提出退出國民黨。

瞿秋白撰〈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純屬捍衛共產國際施諸中國的政策，並且是斯大林路線。過去因以共產國際為正宗，學術界亦一邊倒置是非顛倒於不顧。

### 三

陳、瞿二人在 1930 年代均被國民黨拘捕，亦均有反思。但依然是相殊甚遠、南轅北轍。

陳獨秀在 1932 年 10 月 15 日，由於內奸謝德馨告密，在上海租界被捕，上海公安局以政府通緝案之要犯為由，引渡給中國政府，隨即押解南京被控「危害民國罪」，定於 1933 年 4 月開庭審判。陳在開庭前（2 月 20 日）自撰〈辯訴狀〉。他在〈辯訴狀〉中說，自己所以組織共產黨，是因一戰以後，出現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潮流，使「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民族鬥爭合流並進」。中國的民主革命比蘇俄早七年，「今日二者之榮枯，幾不可比擬」。為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的目標，他列舉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四項任務（反帝、反軍閥官僚、改善工農生活、實現國民立憲會議）。他說：「二十世紀的民主共和國……若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此乃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迫害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之故事，豈容復見於今日之民國」。「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

1933 年 4 月，江蘇高等法院宣判徒刑十三年。陳不服，提出上訴，在〈上訴狀〉中，他說：「吾輩無欺之共產黨，固嘗提出由無產階級、貧農專政之蘇維埃政制之主張，以訴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當對待剝削階級少數人，以專政以實現被剝者大多數人民行使統治權之真正民主國家也。」<sup>14</sup> 當時他已被開除出黨，卻不以個人為恩怨，可知其信仰之真誠無欺若此。

此時也正是他的轉折點。陳在監獄裏開始「對蘇聯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六七年」，終於把「以前的見解全部推翻」。<sup>15</sup> 浪子回頭金不換。1940 年他開始與友人討論總結蘇聯的經驗，最後寫成〈我的根本意見〉，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並說「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的發達」，今日的莫斯科、柏林、羅馬「把現代變成了新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他把俄、德、意三國的體制歸為一類，因「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均見《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

瞿秋白在 1934 年 10 月，江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沒有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 年 2 月 11 日在向福建轉移途中被捕，囚於長汀 36 師師部。5 月 6 日身分泄露。36 師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想從瞿的口中獲得中共和紅軍的機密情報。5 月 13 日，瞿秋白寫了 4,000 字的筆供：「首段敘在滬之生活狀況，中段述剛到匪區之感想，末段為匪區政治的設施，及其對

13 〈斯內夫利特筆記〉1923 年 6 月 12 至 20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2），頁 1917-1925。

14 《法治週報》第 1 卷第 33 期（1933 年 8 月 12 日）。

15 〈致鄭學稼信〉，《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28。該書將此信的時間誤署為 1938 年 12 月 25 日，應是 1940 年 10 月 23 日。

偽政府之鼓吹。因此不便發表。」5月17日到22日，又寫了一篇〈多餘的話〉。

就在瞿〈多餘的話〉竣稿的同一天，南京國民黨高層設法對瞿勸降。蔣介石、陳立夫都會過問，尤其是陳立夫親自作了指導。從勸降的記錄看，沒有收獲。蔣介石於6月2日密令蔣鼎文「就地槍決，照相呈驗」。6月17日晚，槍決於長汀中山公園。天津《大公報》記者有現場報導：「……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獨坐桌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畢乃言曰：『……辭世長逝，為真快樂！』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留下的自傳性文章，其所以命題「多餘」，是因敵方需要他講的話，他已在「筆供」中講了，現在所講的，是敵方所不需要的，而是為自己的「同志」所說的話，所以擔心「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多餘的話〉是瞿秋白以曲線的方式突現自己的成就和所走的道路。但把它與勸降及臨刑時的悲壯場面相比，未免感有遜色。

瞿秋白被捕後，沒有背叛共產黨。說他是「叛徒」的，是他的親密戰友，是出於政治需要。1964年先由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以後宣傳烈士不要宣傳瞿秋白了。」後有1966年周恩來說：「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5月21日）瞿秋白的遺骨本由周恩來按中央決定親自於1955年扶送到北京八寶山的。周在臨死前對羅長青說：「我不是叛徒，瞿秋白也不是叛徒……我對不起他。」周懺悔了。有人則不下罪己詔。這是中國特色的政治鬧劇，不負責任的政治「兒戲」，也是瞿秋白生前由國外引進「鬧劇」的繼續和發展。

我們如果把〈多餘的話〉當作真反思，它沒有超出陳獨秀1933年〈自撰辯訴狀〉和〈上訴狀〉。他把自己取代陳獨秀稱為「歷史的誤會」，或云「捉老鴉在樹上做窩」。還說「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不合適』」。這是遁詞，不符事實。1927年初，斯大林主政的共產國際視瞿秋白值得信賴，作為接班人培養。他自己也為此多方努力，撰〈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就是猛擊陳獨秀的一塊磚。鮑羅廷執行斯大林的指示，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諉於他人，偕瞿秋白赴廬山研究辦法，瞿秋白顯然為維護共產國際威信，以陳為替罪羊未表異議。「八七」會議缺席批整陳獨秀，就是瞿秋白主持的。在陳獨秀的晚年，有人問及此事，陳說：「當時反對我者，以瞿秋白為首，由第三國際代表來公開主持，何只暗中指令，開除黨籍在此後一年。」<sup>16</sup>

瞿說他領導中共，與陳獨秀時不同，「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主持，我卻……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說明中共在陳獨秀時期，尚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文人，「總希望有一個依靠」，終於找到了。瞿代陳後，名義上是中共第二代領袖，實乃共產國際的相輔。瞿說自己是「二元人物」，是指自己身上有「中國士大夫意識」和「無產階級的宇宙人生觀」。兩者「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在〈告別〉中則說，他用「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這裏他是把固有的中國式士大夫意識和情感稱為「異己的」，反客為主。小者個人是如此，大者認同蘇維埃為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

他在〈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中說：「革命由一省或幾省先取得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和土地革命聯繫著等……都是『六大』所採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

---

16 鄭學稼〈陳獨秀先生的晚年〉，《掌故月刊》，香港，1972年第4期。

在『六大』更明確規定下來。」言外之意，這盲動政策，來源於共產國際，他也是替罪羊。這倒是確實的。

由於蔣介石素以蘇俄為頭號敵人，所以對瞿、陳二人處理方式有別。瞿秋白至死忠於共產國際。中統刊物《社會新聞》對他的〈多餘的話〉寫了編者按：「至死不變，進既無悔禍之決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陳獨秀雖已開除出黨，蔣仍不放心，仍把出賣陳的叛徒謝德馨遣送到九江「剿共前線」，「親自對陳與江西紅軍之間有無關係，作了詳細盤問」。<sup>17</sup> 釋疑後才決定以公審判刑。1923年，與鮑羅廷被斯大林派來中國當孫中山政治顧問的同時，蔣介石被派去蘇聯學習訪問，回國後即反蘇。<sup>18</sup> 1924年3月14日，他在致廖仲愷的信中說：「俄人之言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國人（指俄國人）程度卑賤，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寧有此理也。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sup>19</sup> 共產國際其實更沙文主義。<sup>20</sup> 蔣介石不是無中生有，亦非天生仇共。

陳獨秀與瞿秋白在「五四」後，均追求比西方更先進的文明——蘇維埃制度，結果先進反被「先進」誤，不過，兩人的出發點有異：陳獨秀無論新文化運動、建黨或被開除黨籍後，所言所行都以國家、民族為前提，他雖然說「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事實卻正是這樣。他的言行，有個性，有民族性。正因如此，所以為共產國際所不容。瞿秋白不同，幾乎始終均圍繞個人與共產國際及其政策，無全局觀。他的言行，有依附性，有「國際性」。正因如此，他替代了陳獨秀。他倆一個是整人者，一個是被整者，但整人者與挨整者都是受害者。陳獨秀在被捕後，經反思而覺悟了。瞿秋白尚談不上有真正的反思，所以亦無所謂覺悟，他至死仍認為他信仰的東西是正確的。

瞿秋白臨刑前唱了《國際歌》。這《國際歌》是他重新翻譯的，最早發表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他在前言中說，「此歌原本法文，法國詩人柏第埃（Porthier）所作，至巴黎公社時，遂成通行的革命歌」。「自1870年後已成一切社會黨的黨歌，如今勞農俄國採之為國歌，將來且或成世界共產社會之開幕樂呢」。那麼，他在槍決前唱的也是蘇俄國歌。莫斯科以此為基督福音傳佈，瞿秋白並創作《赤潮曲》<sup>21</sup> 為之補充，歌詞的最後說，「何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從今後，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產大同」。嗣後《赤潮曲》由《東方紅》代替，上世紀五十年代，每天曾以《國際歌》啟奏，《東方紅》落幕。沒有救世主，要有大救星。矛盾的雙方，就此統一在同一體中，這也是瞿秋白「先進」的結果。

要科學向前發展，必先正確面對歷史。

---

17 吳基民《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年，頁75。

18 沈寂〈蔣中正先生之訪俄與洞察〉，《近代中國》第153期，台北，2003年3月31日。

19 中國第二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58-168。

20 參閱沈寂〈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從陳獨秀談起〉，未刊。

21 《赤潮曲》與《國際歌》同時發表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 人物研究 ❖

## 從上海到香港 ——張愛玲的雙城故事（1941-1955年）

黃耀忠 \*

### 一、引言

1939年，張愛玲開始在香港大學的三年求學生涯，後來她在上海發表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和《傾城之戀》便以香港為故事背景。1952年，成了名的張重臨香港，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反共小說。如果說張愛玲第一次來港找到書寫的題材和靈感，第二次來港她則尋獲較為自由的創作環境。香港成為張愛玲創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養分，但她兩次的香港故事卻得不到學者同等的關注。2007年，香港大學舉辦的「張愛玲的香港傳奇（1939-1941）」公開展覽固然有助重溫張和香港的歷史因緣，<sup>1</sup>但這樣的回憶也製造了「遺忘」。何以主辦單位對1950年代張在港的經歷視若無睹？誠如蘇偉貞所言，該時期是剖析張愛玲的其中一個「窗口」，<sup>2</sup>暗示當中存在探討空間。事實上，過去對該時期張的研究多集中評價兩部反共小說的文學價值，忽略張愛玲在英國殖民地創作有關作品的經過。亦即是說，香港為張愛玲的創作提供什麼條件？本文論述張愛玲第二次來港的因由及1952至1955年她在香港的活動，以了解1949年後香港為南來文人所提供的文化空間和當中的複雜性。

### 二、第二次來港前的張愛玲：上海文壇紅人

1920年出生的張愛玲，自小在父母的督促下接受中英雙語教育。她四歲時到私塾學習，後入讀美國聖公會的聖瑪利亞女中以及香港大學。<sup>3</sup>1941年，張愛玲尚未在港大文學院畢業便因戰亂重返上海並馬上投身文藝創作。抱持「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1943年在通俗文學雜誌《紫羅蘭》發表以香港為敘事背景的《沉香屑——第一爐香》，開始嶄露頭角。其後她在《萬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研究生。

1 〈2007年10月12日張愛玲再續港大半生緣〉，[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5637.html](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5637.html)（香港大學網上新聞稿），2008年12月12日。

2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231-253。

3 張愛玲原名張煥，洋名Elieen，後按Elieen之譯音改名愛玲。這顯示張自小已受西方文化熏陶。見羅瑪：《凝視張愛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79。

象》、《雜誌》、《天地》等多份刊物發表的大量作品廣受讀者歡迎；輯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等名作的小說集《傳奇》更一紙風行迅速再版，遂令張愛玲一舉成名。<sup>4</sup> 由於熟稔中西文學經典，張愛玲融匯中國古典小說技巧和西方心理刻劃手法來書寫小市民喜聞樂道的男女愛情故事。<sup>5</sup> 張對愛情題材的喜好從她的自白可以證實：「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sup>6</sup> 她無意響應「五四」文學革命後用文字啓蒙救國的潮流。1940年代上海被日本佔領時期，這種「五四文學主流以外」、<sup>7</sup> 不宣傳抗日的創作避免了日本人的禁制，間接令張愛玲迅速成爲上海文壇炙手可熱的新星。<sup>8</sup>

救國救民的文學主流到 1930 和 1940 年代隨著中共崛起和日本侵華而不斷強化，具體表現爲政治對文藝的干預愈益加深。國民黨嘗試以「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清理統一文壇，並宣言打倒「無產階級革命文學」；<sup>9</sup> 中共則於 1930 年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來向文藝工作者進行統戰，要求文人協助國家民族的奮發圖強，「要爲社會而藝術」。<sup>10</sup> 其時文藝界就文學究竟是純個人的創作抑或應教育群眾而展開數次論戰。被推舉爲左翼作家聯盟領袖的魯迅便猛烈抨擊作家施蜇存爲藝術而藝術，只寫個人情懷而不理國家大事。<sup>11</sup> 不難想像，如果張愛玲成名時魯迅仍在生，<sup>12</sup> 也許只寫男女情愛的張亦會步施蜇存後塵而受責難。但無論如何，上海淪陷區不受國共兩黨政治阻撓的創作環境確實造就張的崛起。或正如曾協助張連載小說的《萬象》編輯柯靈所指，「五四時代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己，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爲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她機會。」<sup>13</sup>

事實上，當張愛玲憑藉高超寫作技巧和引人入勝的小說情節在上海大紅大紫時，中國西北的中共根據地延安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學故事。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

---

4 《傳奇》1944年8月15日初版，到同年9月25日再版，見〈附錄——張愛玲研究資料〉，《香港筆薈》總第5期（1995年11月），頁122；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38。

5 同上，頁340-343。

6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載於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77年），頁22。

7 許子東：〈張愛玲與“五四新文學主流”〉，《現代中文文學評論》第5期（1996年6月），頁77-79。

8 柯靈：〈遙寄張愛玲〉，《香港文學》第2期（1985年2月），頁57；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338。

9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50。

10 同上，頁149-155；李歐梵：〈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29年〉，載於費正清、費維愷編，楊品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486-487。

11 有關當時數次文藝論戰經過，可參李歐梵：〈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29年〉，頁486-505。

12 魯迅於1936年辭世，見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27。

13 柯靈：〈遙寄張愛玲〉，頁57。

談會上的講話》(延安講話)，其論點主要有三項：第一，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sup>14</sup> 第二，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sup>15</sup> 第三，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sup>16</sup> 毛澤東繼承及改造啓蒙救國的五四傳統，嘗試調控文藝創作來支援抗日戰爭和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在延安講話的指導下，左翼文藝作品在技巧和內容上都出現「類型化」或「模式化」傾向：作品中的人物都必須性格突出和善惡分明，結局則留下所謂的「光明尾巴」，即表達對未來的樂觀憧憬；另外文字語言需要通俗淺白以適合普羅大眾閱讀。<sup>17</sup> 由是觀之，左翼作家的自主性在政治壓迫下受到極大限制，他們只能在既定框架下咬文嚼字。於是在 1940 年代初戰時的中國大陸，形成了上海和延安兩個大不相同的文化空間。

### 三、第二次來港前的張愛玲：和中共的接觸

隨著中共建政，延安講話的精神也經由強大的行政力量而推廣至整個中國大陸，成為文藝界無可爭議的最高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統戰手段<sup>18</sup>，在政治上團結「民主愛國人士」，在工商業方面容許私有經濟，而在文藝界則拉攏非敵對的知識份子。1950 年 7 月 24 日至 29 日，上海召開「第一屆文化藝術界代表大會」，期望「在廣泛團結的基礎上，總結過去，制訂任務，建立統一的領導和組織，更為徹底地貫徹毛澤東的文藝思想。」<sup>19</sup> 所謂「毛澤東文藝思想」，其核心即是延安講話精神。當時負責上海文藝工作的夏衍對張愛玲十分賞識，故邀請出席。雖然張應約現身會場，但她網眼絨線衫和深灰色旗袍的裝扮明顯和大部分與會者都穿的中山裝或列寧服格格不入。<sup>20</sup> 「與眾不同」的衣著似乎暗示張對無產階級工農兵文藝潮流仍感陌生。至於從張愛玲其時創作的兩部小說可更深入觀察她對新文藝方針的回應。1950 年至 1952 年間，張在《亦報》以筆名「梁京」發表《十八春》和《小艾》。兩部小說都迥異張過去的敘事內容及風格。《十八春》講「舊社會」年輕人赴東北參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過，小說多次提到中共統治下的解放區。至於《小艾》則批判舊婚姻制度和突出階級意識，並在結尾表示對中共統治的樂觀，留下「光明尾巴」。姑勿論張愛玲是否如論者言「迎合政局」，<sup>21</sup> 但其文風改變則無庸置疑。她正嘗試適應和融入時局急變下新的文藝創作空間。

---

1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 年 5 月 23 日）〉，載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年），頁 809-835。

15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言（1942 年 5 月 2 日）〉，載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804-809。

1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 年 5 月 23 日）〉，載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809-835。

17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366-374。

1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 年），頁 455-456。

19 徐重慶：〈關於張愛玲的一則史料〉，《香港文學》第 33 期（1987 年 9 月），頁 73。

20 柯靈：〈遙寄張愛玲〉，頁 56。

21 羅瑪：《凝視張愛玲》，頁 148。

後來張愛玲又赴江蘇參加土改工作，但階級鬥爭的實況令她漸覺無法擁抱社會主義。<sup>22</sup> 張在作品中曾表達其時對新政權的不安以及萌生去意：「離開大陸前，因為想寫一篇小說裡有西湖，我還是小時候去過，需要再去看看，……我頭皮一凜，心裡想幸而是臨時性的團體，如果走不成，不怕將來被清算的時候翻舊帳」、「將來的平安，來到時已經不是我們的了」。<sup>23</sup> 對喜愛上海的張愛玲來說，離開中國大陸是經歷思想掙扎後的艱難抉擇。她嘗試理解及融入新的文藝典範，但似乎最終意識到無法接受改造，唯有迫不得已出走香港，在英國殖民地尋找新的書寫空間。柯靈認為張的離開十分明智，「試想，如果她不離開，在後來的『文化革命』中，一百個張愛玲也被壓碎了。」<sup>24</sup> 1952年3月，張愛玲向香港大學申請繼續修讀戰前未完成的課程，很快她便收到入學通知書。<sup>25</sup> 離開上海前張愛玲和最親的姑姑約定互不通信<sup>26</sup>，既反映她對共產政權的恐懼，亦有助理解她離滬赴港的原因。

1952年9月，張愛玲由上海到廣州後再轉乘火車至深圳，然後經羅湖橋前往香港。當時中港邊境開始實施管制，往來兩地的人士都需接受身份審核。<sup>27</sup> 張憶及大陸邊防對國人出境限制不嚴，持有派出所出境證明文件的她順利通過檢查。過關後張愛玲的心情也許可由其自傳色彩的〈浮花浪蕊〉來解讀，「自從羅湖，她覺得是個陰陽間，走陰間回到陽間。」<sup>28</sup> 在1950年代初，隨著大陸政權的更替，不少居港左派人士返回大陸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亦有部分國民黨支持者、反共分子以及作家如張愛玲等從大陸前往香港。知識份子的流動互調推動中港文化版圖的重新組合：大陸逐漸改造出清一色的無產階級文藝；香港則接收許多不認同左派文藝理論的知識份子，並容許政治取向相異的文人在不損害殖民管治的前提下較為自由地創作。<sup>29</sup>

#### 四、第二次來港的張愛玲：讀書、工作和生活

張愛玲抵港後居於港大的何東女子宿舍，加上開學前申請到1000元的助學金，理應可安心讀書。但她似乎失去求學熱誠，於11月便退學並到日本東京重會好友炎櫻。三個月後，在東京找不到工作的張愛玲無可奈何返回香港。<sup>30</sup> 張的出走惹怒曾協助她申請助學金的港大文學院院長貝查（G. B. Birch）；至於港大追討學費以及張後來在美國向港大索取學歷證明而受

---

22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頁131。

23 張愛玲：〈談吃與畫餅充饑〉，載於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 v. 9 散文卷二：1952年以後作品》（台北：皇冠，2001年），頁109；南方朔：〈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明報月刊》總358期（1995年10月），頁9。

24 江迅：〈柯靈追憶張愛玲〉，《明報月刊》總358期（1995年10月），頁36。

25 黃康顯：〈靈感泉源？情感冰原？——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香港文學》第136期（1996年4月），頁11。

26 宋明煒：《張愛玲傳》（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195-196。

27 Wong Yiu Chung, "The Policie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inese Refugee Problem, 1945-1962" (M.Phil. dis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8), pp. 79-81.

28 張愛玲：〈浮花浪蕊〉，載於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 v. 7 短篇小說卷三：1945年以後作品》（台北：皇冠，2001年），頁267。

29 王宏志：《本土香港》（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頁53-62。

30 黃康顯：〈靈感泉源？情感冰原？——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頁10-11。

阻等事件更令雙方衝突加劇。<sup>31</sup> 張愛玲作為名作家固然是值得港大引以為傲的傑出校友，但原來雙方竟鬧得不歡而散，張愛玲亦再一次未完成在港大的學業。這似乎有助回答何以前述港大的展覽忽略 1950 年代張重回母校的那段歷史。

張愛玲和大多數當時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一樣，旅居心態強烈，但又須面對及解決各種生活困難。因張是精於中英雙語寫作的名家，又曾目睹中共建政初的社會發展，遂得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美新處）官員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的賞識而參與文學創作和翻譯。<sup>32</sup> 美新處除了提供通常的新聞處業務，包括圖書館運作、文化交流、每日首府新聞存檔等等，還推行大規模的美國圖書中譯計畫。與此同時，基於 1950 年代初美蘇冷戰的出現，作為美國政府機構，美新處也積極配合反共的美國外交政策，努力阻撓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美新處為此制訂一份「中國報告計畫」，內容包括報紙新聞記事的製作與傳播、雜誌專題報導、難民電台訪問以及學術論文撰寫等<sup>33</sup>，藉此刻意強調中國大陸的貧困悲苦。為加強宣傳力量，美新處於 1952 年 3 月出版綜合性月刊《今日世界》，稍後又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sup>34</sup> 美新處的工作反映香港成為美國「文化反共」的陣地。而美國政府財政支援的「亞洲基金會」亦於 1951 年至 1952 年在香港資助「人人」、「友聯」及「亞洲」三間出版社的成立，並發行《人人文學》、《中國學生週報》和《兒童樂園》等雜誌，產生所謂「美援文化」或「美元文化」。不少如張愛玲般南來香港的文人作家都曾在上述受美國經濟援助的刊物和出版社發表作品。<sup>35</sup>

張愛玲在美新處最重要的工作是創作《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反共小說，並在《今日世界》連載和交由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sup>36</sup> 《秧歌》刻劃大陸農民的饑餓及引起的民變<sup>37</sup>；《赤地之戀》則訴說主角劉荃在農村和城市多災多難的經歷，反映 1949 年後土改、「三反五反」運動和韓戰對大陸的破壞。<sup>38</sup> 值得關注的是，既然兩部小說的創作受美新處所託，張有多大的書寫自由？張曾憶述《赤地之戀》乃「授權」而作，此因故事大綱皆由美新處擬定<sup>39</sup>；麥卡錫的說法和張稍有出入，他指大綱由張先行準備再交給他過目。<sup>40</sup> 至於《秧歌》的寫作

---

31 同上，頁 11-12。

32 麥卡錫於 1950 年至 1956 年被派駐香港，歷任資訊官、美新處副處長及處長等職。見高全之：〈《秧歌》《赤地之戀》是反共文宣？——麥卡錫談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淵源〉，《明報月刊》總 440 期（2002 年 8 月），頁 74。

33 同上，頁 75。

34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載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

35 同上，頁 2-3；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頁 64-65。

36 也斯：〈張愛玲與香港〉，《香港文學》第 192 期（2000 年 12 月），頁 73。

37 張愛玲：《秧歌》（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

38 張愛玲：《赤地之戀》（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39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載於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1990 年），頁 27。

40 高全之：〈《秧歌》《赤地之戀》是反共文宣？——麥卡錫談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淵源〉，頁 75。

則限制較少，張愛玲對該書亦較為滿意。<sup>41</sup> 本文認為學者對小說的評價顯示張愛玲既滿足美新處的反共需要，亦展示自己的藝術才華。夏志清便認為兩部小說「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甚至盛讚《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sup>42</sup> 胡適亦指《秧歌》「平淡而近自然」，是「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sup>43</sup> 但在中國大陸學者看來，兩部小說的描述不符現實、似是而非，而且張愛玲「違背創作規律和藝術良心」，雖然他們仍肯定張的寫作技巧。<sup>44</sup> 兩種不同評價反映相異的鑑賞標準。夏志清、胡適等人關注文學的藝術性；而大陸學者則貫徹延安講話的原則，強調作品的政治社會意義。但正如梁秉鈞分析「美援文化」的意義時所強調，「受美元援助的機構如友聯，創辦適合不同年齡讀者閱讀的刊物如《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及《大學生活》，創辦宗旨與日後發展有相當距離，無數在其上寫稿的作者也不見得認同最初創辦人背後的宗旨。作者謀生陣營的政治立場都是比較表面的東西。當年的美元文學可用以解釋一些出版社與集團的取向，卻不足以囊括不同作者的心理執著或藝術發展。」<sup>45</sup> 《秧歌》和《赤地之戀》固然透露美國在香港的反共宣示，但決不能視兩部小說為「政治樣板」而抹煞其藝術價值。

張愛玲的「反共任務」亦包括中譯英語文學經典。據麥卡錫的回憶，「愛玲不是美新處的職員。她與我們（美新處）協議提供翻譯服務，翻譯一本就算一本。」<sup>46</sup> 張愛玲翻譯的大多是美國作家著作，包括《愛默森選集》、《美國七大小說家》、《美國詩選》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協助美新處向華人社會輸出美國文化。此外張也曾重新英譯隨國民黨退到台灣的作家陳紀滢之《荻村傳》，然後由美新處在東南亞發行該反共小說。<sup>47</sup> 惟張愛玲顯然十分厭惡翻譯，她曾向友人抱怨：「（翻譯）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sup>48</sup> 另一方面，美援文化和香港言論空間亦為張愛玲發表作品創造有利條件。1954年，張的舊作《傳奇》改名《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由有美援背景的「天風書店」出版。<sup>49</sup> 諷刺的是被譽為張愛玲代表作的《傳奇》初版於中日戰爭時淪陷的上海，其後則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改名再版。這並非歷史的偶然。淪陷區和殖民地阻遏中國政治對文藝界的干擾，故保護及成就了一代才女張愛玲。而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張的作品由於其「小資產階級」風格以及張的政治背景而一直被封殺查禁，直到大陸改革開放後才逐漸獲得解除並准予發行。<sup>50</sup>

---

41 王德威：〈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97年7月），頁36。

42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335，357。

43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頁191。

44 柯靈：〈遙寄張愛玲〉，頁57；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頁188。

45 也斯：〈張愛玲與香港〉，頁73。

46 高全之：〈《秧歌》《赤地之戀》是反共文宣？——麥卡錫談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淵源〉，頁76。

47 余斌：《張愛玲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39-340。

48 于青：《張愛玲傳》（香港：天地圖書，1999年），頁265。

49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頁338。

50 溫儒敏：〈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載於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9-29。關於張愛玲作品被大陸封殺之原因分析，詳參王宏志：〈張愛玲與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書寫〉，載於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

前述張愛玲出走東京反映她和大多數居港難民一樣對香港並不留戀。偏偏在她不喜歡的香港，張卻結識了一生摯友宋淇夫婦。兩人也是 1949 年後從上海南來香港，喜讀張愛玲的文字，對這個流落異鄉的才女十分欣賞，遂為人生地不熟的張愛玲籌措生活所需，令退學後的張獲得安頓。張在港深居簡出，長時間埋首於美新處的工作；她曾在英皇道「蘭心相館」拍照，<sup>51</sup> 又和著名影星李麗華見面，<sup>52</sup> 其他活動則諱莫如深，筆者翻查部分香港舊報章亦無所獲。但以張愛玲之名氣及其居港時間幾達三年，相信有不少珍貴資料尚待發掘。張愛玲居於香港卻恃機離開，最終憑藉個人才華及在美新處的工作經驗，加上由麥加錫作保，順利獲得美國政府〈一九五三年難民救濟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 提供的移民名額。<sup>53</sup> 1955 年，在徐徐駛離維多利亞港的克里夫蘭總統號上，張愛玲告別了香港，直到 1961 年為電影劇本搜集資料才第三次來港。<sup>54</sup>

## 五、總 結

本文所述張愛玲的雙城故事反映 1949 年後大陸文人南遷香港的文化移動過程。張愛玲並非「五四」文學主流的啓蒙救國型作家，但她在淪陷區上海暫時不受政治阻控的特殊環境下，依靠個人才華寫下驕人的文學成就。不過隨著中國大陸越來越嚴格執行毛澤東延安講話的文藝政策，張的寫作空間不斷萎縮，迫使她到港尋找新天地。依靠香港相對自由的文化空間，以及冷戰格局下形成的美援文化，張愛玲在香港完成兼備政治色彩和藝術價值的小說和譯作，反映美援文化對香港文學發展的推動，亦證明文藝不一定是政治的犧牲品。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在中港兩地有不一樣的形態和發展，這有趣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

編：《再讀張愛玲》，頁 222-244。

51 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 年），頁 95。

52 林以亮：〈私語張愛玲〉，載於陳子善編：《私語張愛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38-40。

53 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1997 年 6 月），頁 95；余斌：《張愛玲傳》，頁 359。

54 〈張愛玲編撰紅樓夢劇本〉，《工商日報》（1961 年 12 月 17 日），第 11 版。

❖ 書 評 ❖

## 李炳坤著《陶行知與專題研習 ——兼論其對香港 21 世紀專題研習的啟示》

書 名：《陶行知與專題研習——兼論其對香港 21 世紀專題研習的啟示》

著 者：李炳坤

出 版 地：香港

出 版 社：中華開智網絡教育（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

頁 數：iv + 263

《陶行知與專題研習——兼論其對香港 21 世紀專題研習的啟示》是作者在其碩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寫成的。書首除圖片專輯外，還有〈出版人的話〉和王越、謝錫金、陳建熊撰寫的三篇序言以及作者的〈前言〉（代自序）。正文共有以下六章：第一章是〈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針對 21 世紀香港展開教育改革，要求教師採用專題研習教學方法，教師為此而充滿憂慮的情況，作者「試圖將 21 世紀香港教育改革的專題研究與陶行知教育理念中的專題研習相關部分扯上關係，進而比較及剖析 21 世紀香港專題研習值得借鑑的地方。」（頁 33）兼且概述陶行知主要經歷及教育活動，對專題研習一詞作出定義，闡明其來源與功用。同時，作者又提到探討陶行知與專題研習關係的意義，一方面為教師提供參考，另一方面推動陶行知研究發展。

第二章〈本土化與專題研習釋義〉，解釋甚麼是本土化及其作用，也略述「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中國當年教育本土化改革的成就。」（頁 46）此外，又分析專題研習的起源，外國與中港台學者對其涵義的界定，並且介紹在內容上與專題研習接近的幾種教育方法理論，分別是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自主學習（Independent Learning）、專題習作（Project Work）、問題為本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探究性學習（Inquiring Learning）。接著指出專題研習的理論基礎、專題類型、實行專題研習時必須注意的事項，以及實行專題研習對學生的好處。

第三、四章是〈研究結果（一）：陶行知教育理念與專題研習的關係〉和〈研究結果（二）：陶行知專題研習的實踐〉。前者說明「以陶行知有關專題研習的教育理念」（頁 64）作為探討對象的原因，就是陶氏教育成就卓越、他對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教育建樹良多，還有他在專題研習方面的提倡與實踐，以及對 21 世紀香港教育改革有啟迪作用。後者剖析陶行知對專題研習題材內容、教授與評核方法的意見，更舉例具體地闡明陶氏所設計的專題研習特色，「一個以學生為主導，依學的策略及在指定時間內進行有關生活或對社會有貢獻的專題研究，在良

師指導下先行試驗或真做，經疑難解難、溝通協作、專家評鑑、力求創造而不斷反思、綜合斷語，建構新知識，達到跨學科自學及發展個人多元智能為目標的過程。」(頁 118) 在第四章中，作者兼論陶行知對學習方法、師資、師生關係，以至天才兒童教育的想法與實踐表現。

第五章〈討論：香港 21 世紀教育改革專題研習實踐的思考〉，闡述香港與中外學者——尤其是香港教育統籌局、多元智能論者對專題研習的看法，並且比較兩者與陶行知在關於專題研習方面多項問題的想法，包括：教授目標、題材、課程比例、教學策略、教師職責與條件、評核標準與方法、師生或學生之間關係，以及專題研習如何推動多元智能培育。透過這些比較，作者表示陶行知與多元智能論者的見解有不少相近的地方，對他們的見解更給予肯定，認為陶氏對實行專題研習，提供「不少借鑑之處」(頁 173)；而多元智能論者的理論內容則「博大精深」(頁 175)，值得教學工作者參考。固然陶行知與多元智能論者的專題研習理論具教育價值，不過作者認為這些理論能否順利實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實行時的表現。

最後第六章是〈研究總結〉，綜述與評估陶行知的專題研習內容，其對香港教育界進行專題研習的啓迪。接著說明在香港開展專題研習時遇到的困難和解決這些困難的建議。作者也提到在撰寫該書期間所面對的難題，指出在陶行知專題研習理論方面尚待探討的其他課題。末附「參考文獻」。

書末還有「附表目錄」、「附錄目錄」、「附件目錄」三項。「附表目錄」收載了十二個表，依次是：一、陶行知年表(1891-1946)；二、設計教學法(即克伯屈「專題研習」)在中國 20 世紀初試行經過及陶行知將設計教學法改良成「中國本土化專題研習教學法」的演變歷程；三、薩莉·伯曼(Sally Berman)的專題研習分類及相關標準；四、陶行知始稱「專題研習」的形成過程及其相關教學意念的詮釋；五、陶行知指導或參與的專題研習類別及其相關學習領域與智能發展方向；六、育才學校時期舉行的專題研習音樂劇／歌舞劇／戲劇一覽；七、育才學校時期部分學生專題研習成果／作品演示場所及方法；八、陶行知的「藝友制」與多元智能學說的「師徒制」結構比較；九、培育人才智能的條件特徵：多元智能學說與陶行知教育理念的比較；十、陶行知教育理念與多元智能理論兩者對專題研習理念的異同；十一、比較香港教育統籌局與陶行知教育理念對專題研習的實踐；十二、比較香港教育統籌局與多元智能理論對專題研習的實踐。

「附錄目錄」收錄了四個訪問，受訪者是陶行知的學生或內地陶行知研究專家。還有介紹香港舉行的陶行知學術研討會，以及刊出陶行知 1915 至 1917 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科目及成績表。「附件目錄」則刊登陶行知夫人吳樹琴給作者的最後一封書信和陶氏的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科學碩士畢業論文封面。

陶行知的專題研習理論及其實踐是該書的主要探討課題，為了對此深入理解，作者不僅參考陶行知關於專題研習的著作及中外學者的陶行知研究論著，更前往中國大陸向陶氏學生進行口述訪問，或與陶氏親友互通書信。作者這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史料搜集表現值得嘉獎。然而作者在處理史料方面，有一些做法並不太恰當。書中收錄「王越教授口述訪談紀錄」、「當代中國陶行知研究專家電話訪談紀錄」，但是這些訪問對陶氏專題研習理論與實踐的論述不多。由於訪問內容史料價值不高，作者毋須將它們載入書中，以節省讀者的閱讀時間。

作者雖然採用國外學者的陶行知研究成果，但是只參考日本學者齋藤秋男的《陶行知評傳：政治抒情詩人的一生》一書。其實有關陶行知研究的英文論著亦有一定數量，包括：Chu

Don-chean (朱宥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模式：1917 至 1946 年間陶行知在中國的工作》(*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 Tao's Work in China, 1917-1946*); Yao Yu-sheng (姚鈞汜)的博士論文《教育救國：陶行知的教育激進主義》(*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及〈重新發現教育與社會革命家陶行知〉(*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一文。<sup>1</sup> 還有 Philip A. Kuhn (孔復禮)〈陶行知，一八九一至一九四六年：教育改革家〉(*T'ao Hsing-chih, 1891-1946: An Educational Reformer*)與 Hubert O. Brown〈中國教育中的美國進步主義：陶行知個案研究〉(*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 The Case of Tao Xingzhi*)兩篇論文。<sup>2</sup> 作者卻完全忽略了這些著作，顯示其對陶行知研究成果的掌握仍有不充份之處。

陶行知研究是中國大陸的近代中國教育史研究中一門顯學，研究作品多不勝數，但大多數著作對陶行知在美國留學生活的探討欠缺深入。事實上，留學美國生涯對陶氏教育思想成長有重大影響。陶氏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兩項主張，靈感來自美國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兩句話。而陶氏提倡生活教育理論，該理論創始人正是杜威。眾所周知，陶行知留美期間，曾跟隨杜威學習。關於陶行知留學美國方面，本書刊載了陶氏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科目及成績表，以及他的伊利諾大學碩士畢業論文封面，這些資料未見內地學者使用。若作者利用這些資料，進一步探討陶氏在美國究竟修讀甚麼科目、各科的具體學習內容，這樣也許有助我們認識留美時期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的經過，補充內地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一些空白地方。

既然陶行知與近代中國教育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作者探討陶氏本人事蹟時無可避免地會觸及近代中國教育歷史。對於當時中國的教育發展，作者表示「自鴉片戰爭後，清廷在 1903 年頒佈《奏定學堂章程》，推行赫爾巴特的五段教授法於全國。」(頁 32)一般讀者閱讀這段論述時，會以為由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至 1903 年頒佈章程的六十餘年間，中國教育沒有出現變革。其實在這段時間內，清政府已開展一些教育改革，例如興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同文館，以及軍事和技術學堂，並且派遣國人遠赴歐美學習。由此可見，作者對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中國教育發展的描述是稍欠準確的。最後，書中有一些錯別字，如「曉莊」(頁 20)、「馮玉詳」(頁 108)、「延聘」(頁 115)、「過度」(頁 164)、「勿聞」(頁 198)、「考慮」(頁 246)，應該是「曉莊」、「馮玉祥」、「延聘」、「過渡」、「忽聞」、「考慮」。儘管書中部分內容值得商榷，不過香港學者的陶行知研究成果為數極少，所以這本書的出版對香港的陶行知研究發展，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文兆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1 Yao Yu-sheng,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and "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27, no. 2 (April 2002), pp. 79-120.
  - 2 Philip A. Kuhn, "T'ao Hsing-chih, 1891-1946: An Educational Reformer," *Papers on China*, XIII (December 1954), pp. 163-195. Hubert O. Brown,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 The Case of Tao Xingzhi," eds.,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 Y./London: M. E. Sharpe, Inc., 1987), pp. 120-138.

❖ 書 介 ❖

## 明史研究書籍提要補編（一）

周佳榮\*

### 前 言

數年以前，筆者曾將早歲閱覽明史著作的讀書筆記匯為〈明史研究書籍提要〉，刊於《當代史學》第3卷第4期（2000年12月），其後並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亞太文獻中心作為「史學教研論著輯刊之一」印刷出版。鑑於論述明史的著作日見增多，於是接續編撰《近三十年來明史著述提要》及《續編》、《三編》、《新編》四種當代史學書目專刊，於2007年至2008年間出版，總共介紹了五百種著作。年來又檢拾舊藏書籍若干種，加上新購入的著作，增補了百種之多，已見而仍未寫提要之書則又相繼登場了。茲分批刊出，以供有興趣者參考，因是隨讀隨寫，要待他日整理時再行分類，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周佳榮謹識。

【501】林慧如編《明代軼聞》，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7年台一版。（204頁）

書首有姚光的序，撰於1919年。正文分為八卷：（一）孤忠鑑；（二）義士傳；（三）名士誌；（四）美人譜；（五）異人錄；（六）亂賊記；（七）技術史；（八）異物誌。前六卷為人物傳，後兩卷則人物與事項並載。

【502】〔日〕山根幸夫著《圖說中國の歴史7・明帝國と日本》，東京：講談社，1977年。（200頁）

這是大型彩色中國歷史圖冊的其中一冊，記述明代大事和各方面的發展，並著眼於明帝國與日本的關係，藉此反映當時的東亞局勢。內容共有八章：（一）明帝國的盛衰；（二）日明關係的展開；（三）社會、經濟的發達；（四）民眾的生活；（五）科學、技術的發達；（六）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七）明末農民、市民的鬥爭；（八）明帝國的滅亡與日本。書末有參考文獻、地圖、年表、圖版目錄及索引。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

【503】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405頁)

本書是紀念明清史研究著名學者鄭天挺教授的文集，內容大致分為五輯：(一)季羨林〈憶念鄭毅生先生〉、何茲全〈永遠懷念我的老師鄭毅生先生〉等紀念文章十二篇；(二)陳生璽〈史學大師鄭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識〉、馮爾康〈從三個方面景仰歷史學家、教育家鄭毅生師〉等記述文章九篇；(三)史學研究論文，除了一篇之外，其餘十五篇都是有關明史的，包括何茲全〈何爾健《按遼御璫疏稿》中所見明末遼東邊防情況〉、李小林〈萬曆官修本朝正史活動中的求實精神與實學思潮〉、孫衛國〈錢謙益與王世貞〉、魏千志〈明清時期徽商的家庭文化〉、何孝榮〈論明成祖與佛教〉、汪茂和〈明代的內丹學〉、李夢芝〈論弘治帝的人才思想及實踐〉、劉毅〈明朝皇陵祭祀制度研究〉、林延清〈論明代中期京畿地區莊田的膨脹和清理〉、黎邦正〈論葉淇的鹽法改革與四川鹽法的變化〉、李慶新〈明中期海外貿易的轉型與「廣中事例」的誕生〉、周清澍〈關於銀定與歹成〉、林天蔚〈浪白潞地理考——明代葡人在中國貿易的個案研究〉、何齡修〈東林黨的崛起和鬥爭述略〉及毛磊〈略論明中葉中國落後於歐洲之原因〉；(四)清史研究論文十六篇，包括王鍾翰〈施琅的歷史功過問題〉、韋慶遠〈清代的內務府及其匠役〉等；(五)鄭天挺遺作〈南遷歲月——我在聯大的八年〉及鄭嗣仁〈鄭天挺教授大事記〉等相關文章七篇及〈後記〉。

【504】彭國棟纂修《清史開國前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141頁)

書首有張其昀的序和作者自序。共分五卷，篇目如下：(一)〈清先世之源流〉、〈建州設衛與肇祖投明〉、〈明令董山凡察分掌建州左右衛〉；(二)〈建州三衛叛服無常〉、〈建州潛通朝鮮〉；(三)〈明築遼東邊牆〉、〈陳鉞開釁邀功〉、〈馬文升撫安奏效〉；(四)〈建酋對明廷之恭順〉、〈明廷整飭邊備〉；(五)〈石玠招撫海西夷〉、〈清人偽撰實錄〉。

【505】謝景芳、趙洪剛著《明清興替史事論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364頁)

本書收錄的二十多篇文章，據作者〈自序〉所說，「是教學之餘對明清史學習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明朝政治制度、思想史；明清之際軍事、政治史和有關清朝東北地方史等的一些內容。」論述明代的，有〈假皇帝與代管家——朱元璋廢相後明代閣權之爭與批判〉、〈致君堯舜與強權政治——論明代士大夫與專制皇權的衝突〉、〈理論的崩潰與理想的幻滅——明代中後期的仕風與士風〉、〈明人士、商互識論〉和〈明代仕途蹭蹬下的文人心態——「洪朝選案」的時代思考〉；關於明末的，有〈論「己巳之變」與明清興替〉、〈明末皇太極北擄中原人口考實〉和〈明末煙草傳入東北史事芻議〉。其他由〈天花與清初史事評議〉到〈清代滿族民俗政治化論析〉諸文，都是關於清代史事的。

【506】趙毅著《明清史抉微》，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466頁)

本書除〈自序〉以外，共收學術論文三十八篇（其中有八篇是著者與趙軼峰、王旭、羅冬陽、王景澤、欒凡合撰），分為四編：(一)明清政治史編，包括〈明太祖誅夷功臣原因新探——朱元璋與劉邦的比較〉、〈明代吏員和吏治〉、〈明萬曆朝妖書案抉微〉等；(二)明清經濟史編，計有〈鋪戶、商役與明代城市經濟〉、〈明代鹽業生產關係的變革〉等多篇；(三)明清社會史編，載錄〈明代豪民私債論綱〉、〈悍妻現象與十七世紀前後的中國社會〉等；(四)

史學理論編，包括〈傳統向現代的萌動〉、〈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啓示〉等。

【507】莊練著《明清史事叢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2年。(272頁)

本書收錄文章八篇，依次為〈明代廷杖制度溯源〉、〈戚繼光斬子〉、〈明代的中日朝鮮之戰〉、〈馬士英的翻案文章〉、〈吳三桂封王〉、〈湖州莊氏史案〉、〈記李光地賣友事〉和〈林公井考辨〉。

【508】郭成康、王天有、成崇德主編《中國歷史·元明清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90頁)

本書是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的一種，〈緒言〉之外，共有十二章，分為三編：第一編是「元（1206-68）」，包括〈蒙古國的統治〉、〈元朝前期統治：中央集權王朝的建立與大一統的完成〉和〈元朝中後期統治：中衰與滅亡〉三章；第二編是「明（1368-1644）」，計有〈明朝前期封建秩序的恢復〉、〈明朝中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明王朝的衰敗與社會矛盾的激化〉、〈明朝的對外關係〉、〈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朝文化〉六章；第三編是「清（1644-1840）」，依次有〈奠定國基〉、〈康乾盛世〉和〈嘉道中衰〉三章。附錄元明清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09】陳寶良著《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251頁)

顧誠於〈序〉中強調：「作者在縱向把握整個明代文化的演變過程、橫向分析各流派的特色上，都能獨抒己見，不落前人窠臼。」正文分為四章：（一）緒論——明代文化的動態研究與地域學研究；（二）程朱理學一統與明初文化的保守；（三）王學崛起與市民文化；（四）晚明「實學」思潮的形成與地主階級的文化反思。

【510】劉化兵著《士風與詩風的演進——明代成化至正德前期士人與詩派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267頁)

本書旨在探討明代成化至正德前期的士人心態與詩派關係，以期對當時的文學發展狀況有新的認識，〈緒論〉強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政治、經濟、社會思潮和文學觀念等方面都在發生或醞釀著重大變革。正文分為七章，首章是〈成化前後的士人心態〉，第二、三章是〈茶陵派研究〉和〈七子派研究〉，接著兩章是〈陳莊體研究〉（上、下），第六章是〈吳中派研究〉，第七章是〈成化至正德前期的詩派關係〉。結語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消歇與理學新境界的開闢〉為題，指出殘酷的現實使「士人心中的大明中興、文學復古的人生理想化為泡影……士人紛紛走向道學或釋老，求取心靈的安頓。而王守仁則趁此機會，宣揚己說，完成對文學士人的接引。成化至正德時期由前七子發起的文學復古高潮在此也告一段落。」

【511】朱承著《治心與治世——王陽明哲學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34頁)

楊國榮在〈序〉中指出：「本書以政治學為視域，對王陽明的心學作了獨特的考察。」著者於〈導論〉中交代了一些基本問題、全書脈絡和研究方法等，正文分為五章：（一）王陽明

的政治關懷；(二) 萬物一體與三代之治；(三) 化治世為治心；(四) 良知與政治；(五) 王陽明哲學政治向度的歷史回應。附錄〈去知識以成德性——王陽明的格物說〉。書末有參考文獻和〈後記〉。

【512】陳立勝著《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52頁)

書首有黃俊杰、馮達文的序言。〈引論：問題與方法〉指出「萬物一體」是王陽明思想乃至宋明理學的「基本精神」或「共法」。以下分為四章：(一)「一體」與「仁」；(二) 惡與犧牲結構；(三)「一體」與「樂」；(四) 語式與根喻。最後是〈結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書末有參考文獻、〈後記〉和人名、名詞索引。

【513】夏青、劉伯蘭著《王夫之法律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388頁)

著者在〈前言〉中，對王夫之的思想作了概括的論述。正文分為十章：(一) 生平；(二) 「趨時更新」的法律時變觀；(三) 治國需法，法貴統一；(四)「求天理於人欲之中」；(五) 經濟法律思想；(六) 任法與任人並重；(七) 任法與任道並重；(八) 嚴於治吏；(九) 刑罰思想；(十) 專制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書末有主要參考書目。

【514】張世斌著《明末清初詞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202頁)

劉崇德為此書作〈序〉指出：「書中以詞風為突破點，對明清之際，即明末至清順康時期重要的詞人、流派及其時代詞風、創作成就與影響諸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與探討。」〈緒論〉以外，共有七章，分為兩部分：(一) 上編是「明清易代時期的詞風」，包括〈明末清初「推尊詞體」的努力與詞的發展〉、〈詞從曲化到詩化的轉變〉和〈尊北尚南的詞風語變〉三章；(二) 下編是「明清易代時期的詞人」，依次有〈曹爾堪與明末清初詞風演變〉、〈迦陵詞題材的拓展和風格的創新〉、〈朱彝尊後期詠物詞風格成因探析〉和〈納蘭性德的創作思想與詞作風格〉四章。書末有〈後記〉。

【515】吳雙翼著《明清小說講話》，香港：香港上海書局，1976年四版。(112頁)

這是一本概括介紹明清小說的小冊子，包括以下十二個題目：(一) 明清——小說創作最繁榮的時代；(二) 施耐菴與《水滸》；(三)《三國演義》與歷史小說；(四)《西遊記》孫悟空及其他；(五)《古今奇觀》與短篇小說；(六)《金瓶梅》與人情小說；(七) 清代奇書《紅樓夢》；(八) 吳敬梓和《儒林外史》；(九)《聊齋誌異》及其他；(十)《鏡花緣》及其他；(十一) 清末的小說；(十二) 閱讀舊小說的幾個問題。

【516】傅光明主編《明清小說：劉世德學術演講錄》，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221頁)

書首有傅光明的代序，題為〈大學者劉世德〉。正文收錄劉世德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所作的八次演講：(一)《水滸傳》的作者與版本；(二)《三國志演義》的作者；(三)《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四) 話說劉備；(五) 吳承恩與《西遊記》；(六)《金瓶梅》的作者之謎；(七) 蒲松齡與《聊齋誌異》；(八)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書末有〈後記〉。

【517】袁世碩著《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38頁）

著者在〈自序〉中說，此書是他四十年間所寫的關於明清小說方面的考論文章，總共二十一篇，集中於討論幾本名著：（一）關於《水滸傳》的，有〈《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問題〉、〈郭勳與《水滸傳》〉等；（二）關於《三國演義》的，有〈試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毛本《三國志演義》新序〉等；（三）關於《西遊記》的，有〈說《西遊記》〉和〈清代《西遊記》道家評本〉；（四）關於《醒世姻緣傳》的，有〈《醒世姻緣傳》作者、成書年代考證〉和〈《醒世姻緣傳》導讀〉；（五）關於《紅樓夢》的，有〈《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及其性質問題〉、〈《紅樓夢》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等；（六）此外，還有一些論述《金瓶梅》、《聊齋志異》、《鏡花緣》與《山海經》的文章。書末有〈新版後記〉。

【518】周德昌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421頁）

本書是陳學恂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一種，內容共分八章：（一）明清時期的國家教育機制；（二）明清時期書院的特點；（三）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制度；（四）明清時期的蒙學；（五）王陽明學派教育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六）顏元李塨學派教育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七）乾嘉學派教育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八）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總的來說，第一至四章著重闡述明清時期的教育制度，第五至七章分別探討三個有較大影響的教育思想流派，最後一章概括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情況。書末有〈後記〉。

【519】赫俊紅著《丹青奇葩——晚明清初的女性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278頁）

薛永年在本書的〈序〉中指出，著者「試圖以社會性別的視角，從女性畫家生存狀態與創作的關係入手，整體地探索明末清初女性繪畫與社會和文化的內在聯繫，以求揭示當時一些女性畫家及其繪畫進入當時文人和鑒藏家寫作文本的文化史內涵」。著者的〈序論〉則回顧了研究概況，及說明有關概念和研究方法。正文分為三章：（一）晚明清初文人視野中的女性畫家；（二）明清鑒藏家對女畫家藝術的鑒賞；（三）對幾位女畫家及其作品的個案研究。這些女畫家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區，以江蘇的南京、蘇州和浙江的嘉興、杭州等為中心。〈結語〉認為：「晚明清初江浙地區大量女畫家能夠躋身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地域經濟、士人的心態觀念和文化風尚等方面不同以往的發展變化」。書末有參考文獻和〈致謝〉。

【520】呂景琳著《洪武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345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一種，共有十講：（一）茫茫苦海一浮漚；（二）翻江倒海，嶄露頭角；（三）天塹一躍，魚龍變化；（四）長江三蛟的生死搏鬥；（五）皇帝輪流做，今到牧兒家；（六）創建一個勤政廉潔政府的努力；（七）士大夫的榮與辱；（八）皇帝與丞相；（九）將帥之死；（十）皇帝和他的妻子。

【521】王熹著《永樂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344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二種，共有十講：（一）生逢亂世與少年封

王；(二) 皇藤結瓜與叔侄之爭；(三) 削藩奪權與待機心術；(四) 靖難決斷與奪嫡開基；(五) 設衛立廠與經營邊疆；(六) 四方賓服與出使西洋；(七) 南討北征與工役大興；(八) 千士修典與恢宏氣魄；(九) 御內皇家與奪儲之爭；(十) 功罪千秋與長陵遺恨。附錄永樂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22】趙中男著《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64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三種，共有十講：(一) 候補皇帝：從皇長孫到皇太子；(二) 即位初期面臨的局勢及其活動；(三) 處理威脅皇權的藩王問題；(四) 完善內閣——司禮監的結構體制；(五) 以防守和收縮的政策穩定國防；(六) 守成政治：對國事的調整與改革；(七) 對監察和司法的整頓與加強；(八) 「風流天子」的宮廷生活；(九) 文化藝術方面的愛好及其成就；(十) 朱瞻基及其時代。附錄宣德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23】趙毅、羅冬陽著《正統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63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四種，共有十講：(一) 紫禁城的小主人；(二) 輔政五大臣與司禮「王先生」；(三) 危機四伏的時代；(四) 土木之變；(五) 遷都之議與保衛北京；(六) 整飭武備與祁鎮南歸；(七) 南宮復辟；(八) 石、曹興衰；(九) 勵精圖治；(十) 朱祁鎮及其時代。附錄正統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24】方志遠著《成化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87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五種，共有九講：(一) 皇位繼承的機遇與變故；(二) 成化初政；(三) 皇族事務；(四) 內地民變；(五) 北疆邊患；(六) 朝臣的勸諫與紛爭；(七) 宦官參政與營私；(八) 偏信僧道求長生；(九) 是非功過(兼論成化時代)。附錄成化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25】郭厚安著《弘治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08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六種，共有七講：(一) 充滿憂患的青少年時代；(二) 初登皇帝寶座；(三) 改善專制集權統治；(四) 復蘇經濟安定民生；(五) 邊防隱憂與軍政廢弛；(六) 弘治時期的三大社會毒瘤——宗室、外戚和宦官；(七) 太平掩蓋著憂患。附錄弘治皇帝大事年表。

【526】李洵著《正德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60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七種，共有十講：(一) 明代的中國——社會與皇朝的歷史；(二) 正德天子的誕生和生母之謎；(三) 少年天子醉心於嬉戲生活，不料有兩種勢力在爭奪他；(四) 朱厚照離開乾清宮住進豹房，他在搞獨特的豹房政治；(五) 朱厚照的西北「遠征」，同蒙古人打了一仗；(六) 朱厚照寵信宦官，但他又殺了最大的宦官劉瑾；(七) 「宸濠之變」，朱厚照借機下江南；(八) 正德朝的起義者；(九) 朱厚照之死；(十) 朱厚照與明代貴族大地主階級。附錄正德皇帝大事年表。

【527】林乾著《嘉靖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75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八種，共有七講：(一)天下耳目新；(二)君臣爭大禮；(三)崇道求長生；(四)海盜亂江南；(五)蒙騎踐京華；(六)操術與臣爭；(七)家庭少歡情。附錄嘉靖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28】韋慶遠著《隆慶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36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九種，共有九講：(一)隆慶皇帝其人和隆慶時期的歷史背景；(二)從兩道《遺詔》、兩道《登極詔》看明代中後期政治的大起伏；(三)父皇嘉靖；(四)皇室家庭關係的畸變；(五)皇位繼承危機和嘉隆交替間的複雜形勢；(六)隆慶登極；(七)登極後劣根性的大暴露；(八)「丞相政治」與隆慶朝政局的嬗變；(九)隆慶時期進行的重大改革。附錄隆慶皇帝大事年表。

【529】曹國慶著《萬曆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93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十種，共有十四講：(一)童年好似一場夢；(二)托孤輔臣的爭鬥；(三)傾心委倚張居正；(四)少年天子初長成；(五)青春盛年修壽宮；(六)沉湎於酒色之中；(七)礦鹽稅使的橫行；(八)自命不凡的孝子；(九)遊刃於釋老之間；(十)圍繞立儲的風波；(十一)統治機制的癱瘓；(十二)嚴重的社會危機；(十三)建州威脅的加劇；(十四)駕崩的前前後後。附錄萬曆皇帝大事年表。

【530】林金樹、高壽仙著《天啓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325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十一種，共有九講：(一)父祖恩怨；(二)貪玩成性的童蒙；(三)在危亂中嗣位；(四)救時無術的幼主；(五)在艱難中徘徊；(六)專寵魏忠賢；(七)清洗東林黨；(八)企圖挽救遼東敗局；(九)短命天子。附錄天啓皇帝大事年表。書末有〈後記〉。

【531】苗棣著《崇禎皇帝大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297頁)

本書是「正說明朝十二帝系列」(插圖本)第十二種，分爲五講：(一)平步青雲上九重；(二)守業艱難百事多；(三)勵精圖治總無期；(四)烽火驚傳事日非；(五)生於末世運偏消。附錄崇禎皇帝大事年表。

【532】黎國韜、周佩文著《梁辰魚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311頁)

本書是研究明代著名戲曲家、散曲家梁辰魚的專著，書首有羅斯寧的〈序〉和著者的〈導言〉。正文分爲兩部分：(一)上編是「梁辰魚生平與思想研究」，包括第一至四章，依次爲〈梁辰魚生平考略〉、〈梁辰魚出遊考略〉、〈梁辰魚交往考略〉和〈梁辰魚思想探論〉；(二)下編是「梁辰魚創作研究」，包括第五至八章，依次是〈梁辰魚詩作論〉、〈梁辰魚散曲論〉、〈論雜劇《紅線女》〉和〈論傳奇《浣紗記》〉。附錄五篇，包括〈梁辰魚與鷺峰詩社〉、〈梁辰魚與蓮台仙會〉、〈梁辰魚考訂元劇試解〉、〈梁辰魚活動簡表〉和〈雜劇《紅線女》校注〉。書末有參考文獻和〈後記〉。

【533】町田三郎、潘富恩主編《朱舜水與日本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247頁)

朱舜水(1600-1682年)是晚明諸生，崇禎末年屢奉征辟而不就，明亡後從事抗清活動，失敗後流亡日本、越南、暹羅等國。清初參加鄭成功、張煌言等的反清復明鬥爭，失敗後定居日本，講學二十餘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貢獻。本書是朱舜水誕辰四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收錄中、日兩國學者探討朱舜水生平事蹟、學術思想以及對日本影響的論文十八篇，回顧了朱舜水研究的成果，並提出一些新的史料和見解。書首有吳曉明、吳展分別在研討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上的講話，書末有李鳳全的〈後記〉。著者包括町田三郎、潘富恩、鈴木暎一、楊憲邦、久信田喜一、趙建民、鄧紅、林曉明、疋田啓佑、董平、難波征男、錢明、神戶輝夫、森川登美江、葉樹望、金子正道、衷爾鉅、陳增輝、陶秀璈。

【534】羅炳綿、劉健明主編《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1993年。(301頁)

羅炳綿在題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從舉辦研討會到出版論文集)〉的前言中，交代了本書出版的緣起。全書共收論文二十多篇，按研討會程序分為七節：(一)袁崇煥的生平與事功，包括閻崇年〈袁崇煥固守寧遠之揚摧〉、馬楚堅〈西洋大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解立紅〈袁崇煥京華故蹟考〉、譚世寶〈袁崇煥的籍貫補辨〉和羅炳綿〈天啓朝袁崇煥人際關係的變化〉五篇；(二)中央與地方政治，例如蔡志祥〈明末清初香山縣的功名和宗族重建〉等；(三)中外交通，載有鄭樑生〈明隆慶初右僉都御史塗澤民議開海禁的貢獻蠡測〉等；(四)思想與政論，包括陳支平〈葉春及與《惠安政書》〉等；(五)歷史與人物，收錄英文論文三篇；(六)學術，載有楊啓樵〈評李卓吾的人物評——以《藏書》中評朱熹為例〉等；(七)屈大均的著作與思想，計有李華〈屈大均和他的《廣東新語》〉、鄭克晟〈論屈大均《廣東新語》的史料價值〉、李玉梅〈翁山談雪——屈大均反清思想表微〉和陳祖武〈從袁崇煥到屈大均——明末清初的華南知識界〉四篇。書末附錄研討會資料。

【535】白逸琦著《專制集權的明清盛世》，台中：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443頁)

本書是「中華文明大系」第六種，內容分為五章：第一章〈大明朝——開國與鞏固〉記敘朱元璋得天下的經過；第二章〈擴張與封閉〉分述少主繼位、靖難之役、瓜蔓抄、《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新征之途和守成令主；第三章〈怠惰與腐敗〉重點描寫土木堡、奪門、治亂交替、威武大將軍、大禮議、青詞宰相、南倭北虜和張居正；第四章〈閹黨、倭寇、繻子兵〉分述朝廷中的黨爭、地方上的流寇和來自海陸的雙重外患以至明朝滅亡；第五章〈最後的盛世〉描繪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況及其落日餘暉。末尾以〈之後〉為題，簡述此後中國的遭遇。

【536】楊雪峰著《明代的審判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428頁)

本書共有十章：第一章〈導論〉闡述中華法系和明人的法律觀；第二章〈審判機關(一)——法院〉分述司法機關、法庭和管轄；第三章〈審判機關(二)——法官〉記敘法官及司法人員，並探討法官之選用、待遇、服色和責任；第四章〈起訴〉包括訴訟當事人、告訴、訴訟繫屬和告訴之限制；第五章〈強制處分〉敘述傳喚、拘提(勾攝)、緝捕、羈押、解送和引渡；第六章〈證據〉研究證人、證物和檢驗；第七章〈審訊(一)初審及一般程序〉記敘和

解、審訊期限、審訊原則、審訊要領、筆錄；第八章〈審訊（二）——覆審及特別審訊〉介紹覆審的制度沿革、機關、程序和特別審判程序；第九章〈裁判〉包括裁判原則、判決書、宣告、判決之確定、裁判之效力、裁判費用和裁判之執行；第十章為〈結論〉。附錄明代律例用語選釋和明代判決書中之關鍵文字。書末有參考書目。

【537】王德昭著《明季之政治與社會》，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70頁）

作者在〈前引〉中指出：「明代是在內亂外患的交迫中覆亡的，不過它的外患之所以加劇，還是因為內衰。……作者的初意就在想探索明季這一段歷史的各方面，藉以找出其間的關鍵，以說明明代召致衰亂的主要原因。」正文分為六章：（一）中國歷史上災荒「流寇」之謎；（二）明季人民生活之困苦；（三）「流寇」之起；（四）明季士大夫之腐敗；（五）明季國家機構之解體；（六）「流寇」之敗滅。書末有〈尾言〉。

【538】胡慶鈞著《明清彝族社會史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96頁）

本書收錄論文八篇，關於明代彝族的有〈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隸制度〉、〈明代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明代彝族社會的冤家械鬥〉、〈明末天啓、崇禎年間的「奢安之亂」〉和〈明朝在彝族地區推行的統治政策〉，關於清代彝族的有〈清代彝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清初以來彝族奴隸制度的變化〉和〈清初以來彝族的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附錄〈解放前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研究述評〉。書末有〈後記〉。

【539】王志忠著《明清全真教論稿》，成都：四川巴蜀書社，2008年。（147頁）

著者開宗明義，在〈引言〉中指出：「研究明清時期全真教從沉寂到復興的歷史，對於我們弄清中國宗教的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關係，弄清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發展的特殊規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正文分為四章：（一）明朝的道教政策與全真教的沉寂；（二）明清之際的社會危機與全真教的中興；（三）明清之際全真教的傳播與宗派的繁衍；（四）明清之際全真教思想的發展及其特點。〈結論〉綜括了全真教在中國近古的思想啓蒙運動中的作用。正如卿希泰在〈序〉中所說：「全真教在這一歷史時期經過蕭條、整合到中興，這一歷史現象不僅說明了全真教自身的適應性和兼容性，也體現了全真教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改善、自我發展的勃勃生機。」附錄永樂年欽選各宮觀道官及部分道士宗派表。書末有參考文獻要目。

【540】馬今洪編著《明清銅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38頁）

本書是「文物鑒賞叢書」的一種，介紹明清兩代的銅器，編排分為兩部分：前半以文字為主，包括〈前言〉、〈明清銅器的種類與使用〉、〈明清銅器的鑒賞〉和〈明清銅器的鑒定與辨偽〉，並有相關插圖數十張；後半以圖版為主，收錄明清銅器圖片一百多張，各有一段文字說明。所有圖片均為彩色，可供鑒賞。

【541】鄧潭洲著《王船山傳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37頁）

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王船山的生平事迹〉敘述王夫之的家世和不平凡的青年時代、關心和支持兩湖的抗清鬥爭、獻身永曆政權、在流亡生活中和隱居荒山勤著述；第二章〈王

船山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和理論淵源〉探討其思想形成的背景；第三章〈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分析其自然觀、辯證法思想、認識論和歷史觀；第四章〈王船山的社會政治思想〉究明其民族、政治、經濟和教育思想；第五章〈王船山的詩論〉強調其詩論以儒家思想為主要理論根據，對後世的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有深刻的影響。書末有〈後記〉。

【542】初曉波著《從華夷到萬國的先聲——徐光啓對外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275頁)

明末士大夫徐光啓在與來華耶穌會傳教士往來的過程中，出現了對華夷觀念的反思與批判，主張採取開明的海外貿易政策和引進西方先進的火炮，以及加強對歐洲諸國的認識等，新觀念引發了對外行爲的諸多變化。徐光啓傳播的知識和闡發的「會通超勝」等思想，是中國人對外觀念從華夷天下轉變到世界萬國的先聲。〈緒論〉就相關觀念與研究問題作了闡釋，正文分爲五章：(一)徐光啓對外觀念的背景研究；(二)華夷觀念對徐光啓對外觀念的影響；(三)徐光啓對外觀念的新變化；(四)徐光啓對外新觀念與對外行爲；(五)對外觀念轉變的停滯與原因分析。〈結論〉指出：「徐光啓對外觀念的產生、發展和轉變，不是簡單的對外力衝擊的反應，而是和當時中國社會已經產生的經濟、思想等領域的變化密切相關，是中西互動的產物。」

【543】戚曉杰著《明清山東方言背景白話文獻特殊句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277頁)

開宗明義，著者在〈緒論〉中論述了明清山東方言背景白話文獻特殊句式研究的價值、研究現狀並說明本書所採用的方法、思路及內容概要。正文分爲七章：(一)比較句式；(二)比擬句式；(三)包括和強調句式；(四)被動句式；(五)處置句式；(六)反覆問句式；(七)動詞拷貝句式。〈結語〉指出：「明清時期作爲古今漢語之間相銜接的一個發展階段，其北方方言特殊句式也存有自身的特點與規律。」這主要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結構不甚緊湊；第二，語序尚不固定；第三，省略形式多樣；第四，構成方式豐富；第五，語義表達不夠嚴謹周密，有時還會出現重覆、缺漏現象。

【544】繆咏禾著《中國出版通史(5)·明代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455頁)

書首有〈導語〉，簡略敘述了全書的主旨。正文分爲十二章：(一)明代出版事業概況；(二)官府編撰的圖書；(三)私家的編撰；(四)書坊的編纂；(五)明代的出版機構；(六)明代著名出版家；(七)明代與東西方國家的出版交流；(八)明代出版物的裝幀設計和印刷；(九)印刷技術的改進和革新；(十)明代圖書的經營、流通和收藏；(十一)明代出版和明代社會；(十二)明代少數民族文獻的出版事業。〈結束語〉指出明代的出版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雕版工藝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其標誌是銅活字、木活字已經成爲一定的生產力，在出版物中佔有相當比例。附錄〈明代出版大事記〉和〈參考文獻〉。

【545】趙園著《明清之際的思想與言說》，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235頁)

本書收錄四篇文章，依次是〈說「戾氣」〉、〈時間中的遺民現象〉、〈談兵〉和〈我讀傅山〉。據作者在〈序〉中所說，這幾篇分別取自他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其續編，經刪改和

校訂後，而成爲獨立的文章。附錄兩篇，亦是上述二書〈後記〉的節錄。書末有作者簡介和著述年表。

【546】陳達生著《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91頁）

本書對佛教與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和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傳入東南亞，以及其本土化的機制和過程，都作了研究。書首有王賡武、鄭一鈞的序文兩篇和作者自序，正文共有八章。第一章〈導言〉以下，分爲兩篇：上篇「中國、印度與伊斯蘭文化交流」，包括第二章〈文化融合：佛教傳入中國〉和第三章〈伊斯蘭教入華與漢化〉；下篇「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依次爲第四章〈東南亞伊斯蘭化探源〉、第五章〈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化〉、第六章〈鄭和與海外華人〉、第七章〈島嶼東南亞華社與伊斯蘭教本土化〉和第八章〈結論〉。書末有參考文獻和人名、地名索引。

【547】汪滌著《明中葉蘇州詩畫關係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300頁）

書首有胡曉明的〈序〉。〈引言〉以下，分爲五章：（一）詩畫一律——理論與現實的差異；（二）明中葉的蘇州社會與詩畫文化；（三）明中葉早期的蘇州詩畫關係；（四）「吳中四才子」的詩畫關係；（五）文徵明傳派及晚明蘇州的詩畫關係。〈餘論〉總結了吳門詩畫關係對此後明清文藝發展的影響，並探討了詩畫關係研究方法本身的意義和啓示。附錄〈參考文獻〉、〈明中葉蘇州文人詩書畫活動大事年表〉和〈明中葉蘇州重要詩畫合璧作品表〉，書末有〈後記〉。

【548】黃海濤著《明清佛教發展新趨勢》，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171頁）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爲明清時期是中國佛教的衰落期，其實不然，而是下啓近代現代佛教發展的一個「關節點」。著者在本書〈前言〉中指出：「明初統治者改變以往統治者對佛教採取或崇或毀的偏激政策，採取比較適中、實用的佛教政策——既限制又利用的雙重政策，再加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以及佛教自身的綜合作用，隨之而出現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新趨勢，即佛教向世俗化方向發展。」正文分爲六章：（一）明清時期的佛教政策；（二）明代佛教發展新趨勢之一：居士佛教的興盛；（三）明代佛教發展新趨勢之二：三教合一論和諸宗融合思想；（四）由明及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邊地佛教的興盛；（五）晚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人間佛教」的興起；（六）結論及啓示。書末有〈主要參考文獻〉。

【549】汪崇篔著《明清徽商經營淮鹽考略》，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282頁）

書首有曾凡英、劉伯山序文兩篇。〈引言：對徽商經營淮鹽最早時間的探討〉指出：徽州人遷徙兩淮的年代可溯至宋代，科舉業績是有力的依據，徽商應是明前葉的淮商主體。第一章〈徽商在淮鹽經營中的角色定位〉分別以明前葉和中葉的事實爲討論基礎，疏理明隆慶年間和萬曆晚期的兩淮鹽政，說明清嘉道時期兩淮官鹽的壅滯，對清道光淮北改引爲票作了論述，從而探討徽商的歷史作用。第二章〈成本分析與估算〉包括明嘉靖初年、萬曆後期和清乾隆朝以及嘉道時期，並對乾隆朝江春借帑和嘉道時期江仲馨獲利數據作了分析。第三章〈不堪重負，趨向衰落〉從乾隆兩淮提引案看鹽商不堪重負，又從陶澍理鹽看道光朝鹽商衰落。書末有〈附錄〉和〈後記〉。

【550】方志遠著《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遠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402頁)

書首有〈導論〉，就一些基本問題作了交代。正文分爲三篇，共十七章。上篇「明代中央決策系統的權力關係：內閣、內監與皇帝」包括：(一)「三大府」的設置與中書省的廢除；(二)翰林春坊官平駁奏啓與內閣的出現；(三)內閣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四)司禮監的崛起及中央決策系統的「以內制外」；(五)「以內制外」的保障：明代宦官的知識化問題；(六)明代皇帝的「事必躬親」與「垂拱而治」。中篇「明代中央行政系統的權力制衡：外廷、內府與科道」包括：(七)廢除中書省後「彼此頡頏」的外廷與內府；(八)明代官員選拔、任用中的權力分配；(九)明代財政管理中的權力關係；(十)明代的軍事力量及領導系統的「三權分立」；(十一)明代的法律與司法權力結構；(十二)明代的監察權力及運行。下篇「明代地方國家權力的調整與重組：撫按：司道與鄉里組織」包括：(十三)行省、三司與三堂：明代省級權力結構的調整；(十四)「三堂」到「巡撫」：明代省級國家權力結構的定制；(十五)明代的「道」：分巡、分守與「整飭兵備」；(十六)明代府縣「親民官」及其施政方式；(十七)明代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延伸。書末有〈引用文獻〉及〈後記〉。

❖ 書 介 ❖

## 中國連環畫史新書兩種介紹

丁 潔\*

■ 一可、未名、王軍編著《小人書的歷史——漫談中國連環畫百年興衰》，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237頁）

本書回顧了中國連環畫藝術發展的百年興衰，帶讀者領略了當年的優秀作品、知名畫家和其中許多有趣的故事，書中還收錄了大量的史料和精彩的圖片，全面地展示了連環畫這一藝術形式的魅力。全書分爲六章：第一章〈遊弋在歷史長河之上（民國以前）〉，講述了連環畫的前世今生、現代連環畫的種類、連環畫的開本與版次；第二章〈戰亂中的發展（20世紀初—1949年）〉，介紹了市井中的藝術畫卷、漫畫大師、連壇“衆星”、解放區的木刻連環畫、來自文藝界的爭論；第三章〈建國後的鼎盛（1950—1965年）〉，討論了政治運動中的連環畫、形式喜人的60年代初期、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評獎；第四章〈“文革”時期的狂飆（1966—1976）〉，介紹了一切爲“革命”的連環畫、1973年後的短暫發展和“文革”時期連環畫的特色；第五章〈“黃金”時代的來臨（1977—1985年）〉，分析了連環畫的兩種藝術風格、又一次百花齊放的繁榮、繁榮下的泡沫，以及突如其來的蕭條；第六章〈艱難求索的二十年（1986年至今）〉，講述了飄揚的紅飄帶、連環畫的內憂外患、第四屆全國連環畫評獎、意料之外的新事物——新版連環畫，以及落寂後的熱情——收藏。書末附有〈歷屆全國連環畫評獎獲獎作品〉。

■ 魏華《新中國連環畫藝術簡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231頁）

本書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連環畫藝術發展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按時間順序，分門別類對比歸納，探尋新中國連環畫藝術的發展和演變軌蹟，試圖找出其興衰變化的規律，以期給當今藝術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鑑。全書在〈導論〉後分爲五章：第一章〈第一繁榮期（1949～1966）〉，討論了連環畫繁榮的原因、連環畫快速發展及其傑出的藝術成就；第二章〈畸變期（1966～1976）〉，探討了連環畫的畸變原因、畸形發展以及“政治統帥一切”下的連環畫；第三章〈第二繁榮期（1977～1985）〉，說明了連環畫再次繁榮的原因、再度繁榮的情況和輝煌的藝術成就；第四章〈衰落期（1985年以後）〉，分析了連環畫衰落的原因、它的艱難發展、衰落的連環畫藝術、連環畫收藏熱的興起和留下的思考。書末附有〈參考文獻〉和〈後記〉。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研究生。

❖ 學界動態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 (2008年下半年)

### (一) 教研活動

#### ※ 2008年歷史系研究生講論會

日期	題目	報告者	主持
2008年 8月20日	Western <i>Muliao</i> in Li Hongzhang's <i>Mufu</i> , 1875-1895: Case Studies on Gustav Detring and Hosea Ballou Morse	Po Chung Yam	Prof. Mak King Sang
	香港少年罪犯改造藍圖的誕生：教導所的 成立及其歷史意義	何仲詩	黃文江博士
2008年 12月18日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內容和特色—— 兼論王錫祺的輿地思想	區顯鋒	周佳榮教授

#### ※ 2008年「歷史及史學研究講論會」專題報告

日期	題目	報告者
2008年 11月6日	近世日本歷史巨變的紀錄者——姜沆和他的《看羊錄》	區顯鋒
	三聯書店歷史回顧及研究述評	丁潔
	試論《春秋》雜誌的歷史意義	何仲詩
2008年 11月20日	中國醫療史研究中的性別意識——以李貞德著《女人的中國 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為例	呂凱鈴
	文學和歷史——張愛玲的香港故事（1952-55）	黃耀忠
	清季華洋幕府的合作與互動——以馬士（H.B. Morse）、馬 相伯、馬建忠在李鴻章幕府的關係為例	布琮任

本研究科目由周佳榮教授主持，全體研究生並於2008年10月30日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出席在該館舉行的三聯書店六十周年店慶活動。

※ 「中國報刊與廣告發展」專題報告

日期	題目	講者
2008年9月24日	中國近代出版文化與新知識群的興起	周佳榮教授
2008年10月8日	書中有畫：中國插圖史概述	丁潔小姐
2008年10月15日	躍動中的巾幗身影：圖說近代中國女子體育	侯勵英博士
2008年11月26日	《叻報》（1881-1932）——新加坡早期華文日報的探討	羅婉嫻博士

※ 「亞太城市的博物館與文化教育」參觀活動

浸大歷史系於 2008-2009 年度上學期開辦「亞太城市的博物館與文化教育」一科，由周佳榮教授主講，修習同學包括本系研究生、本科生及來自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吉林大學的交換生。除講授、報告外，還舉辦了三次校外參觀活動：

第一次於 10 月 16 日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並參加「戲台上下——香港戲院與粵劇」展覽開幕儀式；

第二次於 10 月 24 日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及香港科學館「楚雄瑰寶祿豐龍」展出；

第三次於 11 月 21 日參觀孫中山紀念館、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以及在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的「北京人走進香江——周口店遺址圖片展」。

※ 「東南亞史專題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羅婉嫻博士於 2008 年 11 月 23 日作專題演講，題目是「淺談東南亞史研究經驗：以新加坡殖民時期的醫療史為例」。

## （二）訪問學人

※ 臧健教授——2008 年度王寬誠教育基金訪問學人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臧健教授應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之邀，以 2008 年度王寬誠教育基金訪問學人身份，於 2008 年 11 月間來港訪問及交流，其間並作兩次學術演講，日期及題目如下：

- ◆ 2008 年 11 月 3 日，主講「宋元時期立嗣、收養習俗與婦女生活」；
- ◆ 2008 年 11 月 7 日，主講「民國以來中國婦女史研究反思」。

※ 劉蓮芬博——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訪問學人

貴州師範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副教授劉蓮芬博士應浸大歷史系的邀請，於 2008 年 9 月來港擔任本系訪問學人，本學期作了兩次學術演講，日期及題目如下：

2008 年 9 月 25 日，在「歷史及史學講論會」主講「亞非會議後中泰關係改善對美泰關係的影響」；

2008年11月14日，於「社會科學院研究支援網絡研討會」主講「淺談抗戰期間的駝峰空運」。

劉蓮芬博士訪港期間的研究計劃，是1950至1970年代香港與亞洲冷戰；此外，劉博士將於下學期為本系中國研究課程講授「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傳統」一科。

※ **胡衛青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

胡衛青教授應浸會大學歷史系的邀請，於2008年11月來港，擔任本系近代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並作了兩次學術演講：

2008年11月25日，在「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2008年度）」主講「基督教如何進入中國？以潮汕教會醫院為個案的解釋（1864—1949）」；

2008年11月29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合辦的公開講座主講「近代中國教會的自立：以潮惠長老會為典型個案（1881—1951）」。

### （三）公開講座

※ **Public Lectu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Title: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Eleventh-Century China:

The Narrative and Empirical Feats of Ouyang Kiu

Speaker: Prof. Richard L. Davis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Lingnan University)

Date: October 24, 2008

※ **歷史學系公開講座**

資深文化工作者陶傑先生應邀為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的兩個講座作專題演講，日期及題目如下：

日期	講座名稱	題目
2008年11月28日	婦女運動史講座	西方婦女運動
2008年12月1日	中國文化講座	漫談中國文化

※ **新歷史講堂（2008年）**

主辦：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三聯書店

地點：創 Bookcafe（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二字樓三聯書店樓上）

講次 / 日期	講題	講者
第1講： 2008年9月6日	近代福建軍事之變革	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第2講： 2008年10月11日	香港考古新發現	吳偉鴻先生（香港註冊考古學家）

第 3 講： 2008 年 11 月 1 日	近代中國畫報與視覺文化的興起	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侯勵英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及兼任講師）
第 4 講： 2008 年 12 月 6 日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鄒興華先生（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 （四）教授活動

- ※ Prof. Chung Po Yin（鍾寶賢教授），Migration and Enterprises: A Business History of Three Migrant Families in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860-2000（28 November 2008, Research Support Network Seminars Series AY2008/09,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KBU）
- ※ 周佳榮教授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邀請，2008 年 12 月 1 日在「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詮釋」研討班作專題演講，題目是「歷史教學中的歷史研習態度與方法」，與會者均為中學教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 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紀要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的「丁日昌與近代中國研討會」，2008年12月3日及4日一連兩天在浸大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廳舉行，是在香港地區首次舉行的關於近代中國改革家、思想家、藏書家、出版家丁日昌（1823–1882年）的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十七篇。丁家駿基金會、章群教授紀念公開學術講座基金贊助了研討會部分活動經費。

### 程 序 表

#### 開幕式

- 致歡迎辭：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 致開幕辭：丁新豹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名譽高級研究員）
- 嘉賓致辭：趙令揚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
- 致送紀念品：傅浩堅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 拍照留念

#### 第一組

主持：張偉國（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1. 劉智鵬／劉蜀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 ◆ 丁日昌研究述評
2.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改革時代的務實主義者——論丁日昌的政治性格和文化取向
3.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 選擇的記憶：以《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

#### 第二組

主持：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1. 馮錦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 西洋砲台築城學在東亞的傳播：以丁日昌（1823–1882）《西法砲臺圖說》與大鳥圭介（1832–1911）〈築城典刑〉為中心
2. 葉深銘（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 黃勝（1824–1902）與晚清軍事工業近代化——以其所譯《火器略說》為中心

3. 胡志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 ◆ 丁日昌的藏書、著書、編書與禁書

### 第三組

主持：李培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 科大衛 張瑞威（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 十九世紀中葉的縣級行政

2. 卜永堅（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 丁日昌與晚清鹽政

3. 布琮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晚清幕僚性質的轉變與發展——以丁日昌 1843 年至 1864 年的在幕生涯為例

### 第四組

主持：蘇維初（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1. 馬楚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 英人開市潮州所致衝突與丁日昌之解紛

2. 馬木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 開捐賑災：丁日昌與光緒初年潮汕地方社會的重建

### 第五組

主持：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 丁潔（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江蘇巡撫時期的丁日昌

2.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黃嘉康（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 ◆ 內地化與近代化：清季丁日昌與台灣新政之論述

3. 丁新豹（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林國輝（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 ◆ 丁日昌與香港二三事

### 第六組

主持：朱益宜（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志絜行芳報國恩——丁日昌與何紹基交遊和創建絜園經過

2. 林啓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丁日昌與王韜之海防思想

3. 區顯鋒（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 丁日昌督譯《柬埔寨以北探路記》之研究

### 大會總結

主席：麥勁生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致閉幕辭：丁新豹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